

“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碗里头”

在有关延安的一些电影资料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选豆”……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选豆法”进行选举的场景。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既可以减少选举成本，也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甚至操纵，能更充分地体现民意。

豆选连同烙票、划杠等淳朴的投票方式，演绎着生动的草根民主，为日后人大表决所借鉴。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多用“选豆法”。

“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到了1949年，政协普遍采用举手和鼓掌的方式，表决选举任免和重大公共决策等。1954年后，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会议选举、通过议案和基层直接选举采用举手、无记名投票方式（又称票决，源于公元5世纪古希腊，图以球投票，白色球表示同意，黑色球表示反对）；间接选举人大代表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机关人员必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进行其他表决时，举手逐渐代替鼓掌。

但是，1958年后，除了选举和任免，鼓掌又成了主要表决方式。直到1979年，才恢复了举手和无记名投票。

实行无记名投票后也有弊端：若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票上不画任何符号；不同意选票上候选人的，可在选票符号栏内画“×”；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弃权画“√”。这种表决方式导致代表投票隐私不保。那些要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必须动笔，这样一来，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获悉。直到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才扭转这一态势，会上表决通过了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无论是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

他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和举手相比，票决还是在民主的形式上前进了一步。1982年，弃权票渐渐浮出水面。当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3位代

从鼓掌到投票，从投豆子到按电子表决器，两会表决方式的“进化史”见证着民主法制的前行步履。



1983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顺兴说：“我反对！”

两会表决演变史

表投弃权票的现象。当时，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但大会秘书组有些担心。据李尚志事后撰文回忆，有位同志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过去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通过一些重要决议，决定，都在新闻报道稿中写为‘一致通过’了……我们总不能把不同的意见公诸报端吧？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嘛！”

而随后的剧情有了戏剧化的转变，当他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后，胡耀邦爽快地说：“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随后稿子原样发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境外媒体把它视为“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

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代表都从来想不到可以投反对票。而这种局面的改变，是因为一个名叫黄顺兴的人大代表。

黄顺兴的政治生涯，是在海峡对岸开始的。他是台湾彰化县人，生于1923年，是一位农业专家。在国民党戒严期间，他竞选成为三任台东县议会议员、两任台湾“立法委员”，因敢于直言而得名“黄大炮”。台湾代表团选他为七届全国人大代

表，并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讲了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苦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虽然周谷城还是当选了，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现了反对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反对票就多”

1990年，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这是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

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一般都采用按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这两种方式。在诸如对宪法修正

案的表决，决定国务院总理，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时用纸质投票方式。而其他议案，如法律案、预算案等等，则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

使用电子表决器，从表决开始到表决结果揭晓，仅需短短几秒钟，表决结果通过会场前方的两个大电子屏显示出来。计算机系统只会对赞成、反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器这4种结果进行数字叠加，不会留下代表的表决记录。相较于传统的举手、鼓掌等方式，电子表决器更加客观、真实。

对于表决器的安全性，这套系统的总设计师林达亮曾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一开始设计，人大常委开会办公厅领导人就明确交待：这套系统必须是无记名的。不仅表决之时查不出，表决之后也要查不出投票人。”

“初次与表决器‘亲密接触’的代表们，曾对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感到疑惑。1999年的一次政协常委会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故意不按按钮，在其他委员都按完了以后，他才按下表决器，这时屏幕上的‘未按人数’减了一位，‘已表决人数’增加了一位，表决器就是这样通过委员们的亲手检验才被接受的。”全国“两会”整体会议系统供应商曹昕军说。

“一些地方人大、政协在初次使用电子表决器的时候，为了证明其可靠性，在预备会上都按赞成

或反对，核实统计结果是否相符。”曹昕军说，“代表委员们自己使用过一次，心里就有底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电子表决的模式，很快在32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少数市、县级人大常委会推开，个别地方人大会议也开始使用电子表决。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遭到否决。当宪法学家把它誉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时，我们不能忘记电子表决器的功劳。

2002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坦率地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电子表决器也经过了逐步改进。原来的电子表决器系统启动，按下哪个按钮哪个灯就变暗，另外两个还在闪，这当然会令代表们顾虑重重。改进后，只要按一下按钮，所有灯全灭。

到了2010年全国两会，又展开了一场表决器要不要盖盖子的讨论，当时有代表反映“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间距太宽了，你摁哪个键别人都能看得见”。随后就有关呈远、韩方明等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为投票表决器加上盖子。对此韩方明介绍说，虽然现在的电子表决并不会记录每个委员投的是什么票，但旁边的人可以看得见，更何况直播表决现场的时候，还有摄像机扫过来。

(摘自《解放日报》)



2011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代表们用电子表决器投票

东京审判检察官诺兰

把松井石根送上绞刑架

“在你的宣誓证词第9页中间，你说一些冲动的年轻军官在南京犯了罪行。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亲眼所见，但我从记者那儿听说了这些事。”

“那么，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罪行是什么呢？”

“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资。”

“还有谋杀？”

“也有。”

这是70多年前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恶魔松井石根时，著名的“诺兰质询”中的重要片段。

近日，旅加华人余承璋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加拿大检察官诺兰档案》，3038页的档案收录了战犯松井石根的主起诉官诺兰的生平资料、证书和手稿等，还原了当年法庭上检察官如何拆穿松井石根的狡辩，揭露了他“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谎言。对于诺兰这位替中国人民伸张正义的关键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知之甚少。

亨利·格兰顿·诺兰，加拿大籍军事家、法学家、教育家。二战结束后，作为东京审判11个联盟国的检察官之一，诺兰被指定为南京大屠杀一案中松井石根的主起诉人。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这次长达两年的审判，最后判处了日本7名甲级战犯，而松井石根就是其中之一。

“像松井石根这些被告，不仅有日本籍的律师，还有美籍的辩护律师。所以不能把战犯定罪，检察官起着重要作用。检察官需要在法庭上提出恰当的问题和充分的证据，来将战犯绳之以法。”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介绍。

历史的镜头转回1947年10月14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松井石根向法庭提交了经过宣誓的证词，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同时，他还辩称，自己在战争结束时，才在美军的广

播中第一次听说了南京大屠杀。

法庭上，诺兰用看似普通的问题盘问松井石根：

诺兰：“是谁说日军犯下了罪行的？”

松井石根：“至于是谁说的，我也说不清楚。但应该说谣言最初是某个中国人的戏言，而这个谣言又由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加以传播。”

诺兰：“撇开谣言的玩笑一面不说，究竟是誰告诉你这些谣言的？”

松井石根：“至于具体是谁，我也记不起来了，但他也是我的一个部下。”

诺兰：“是你手下的指挥官吗？”

松井石根：“是的。”

诺兰：“所以，你就去告诉阿班先生（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以免使其真相遭到（读者）误解。”

松井石根：“是的。”

诺兰：“当时，你不是没有收到手下调查人员的调查报告吗？”

松井石根：“是，但我收到了一些零星的报告。”

诺兰：“零星的报告，从谁那里获得的？”

松井石根：“我指的是从宪兵那里获得的信息。”

诺兰：“你收到不止一份情报吗？”

……

在诺兰的追问下，松井石根不得不承认，1937年12月，他从记者那儿听说了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资的事件；从宪兵那儿听到谋杀的报告；从日本领事馆领事那儿听到性质相仿的报告。

他不可能对南京城当时发生的惨剧一无所知。松井石根最终被判死刑（绞刑），成为唯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因南京大屠杀被判处死刑的日本甲级战犯。

(摘自《周末》)

谢觉哉眼中的国共饮食作风

在“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干部吃饭问题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

1937年秋至1938年秋，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党代表。这一时期，他的日记的对国统区的吃饭问题着墨颇多。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党军依旧未改其脱离群众的本色，甚至在吃喝问题上发展到对群众巧取豪夺。谢觉哉在1938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樊先生来谈兰垣腐化情形，招待约二百苏联友人，伙食每天可剥削五百余元，每人每天四元八角，实际不过两元。伙食如此，其他可知。”

国民党军队不得民心。谢觉哉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杨云凉州军队万余，每人日食面一斤半，马数千匹，每匹日食料三升”，“均向人民摊派，摊摊者计六县，群众苦不能言”。在1938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生气地写道：“一些无心肝的官吏有的说‘明天就要牺牲，今天应该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甚稳了，趁时会抓几个吧！’贪官土劣狼狽为奸，怨气冲天，多数人民朝不保夕”。

1938年9月，谢觉哉终于回到延安。抵延不久，谢觉哉便向边区建设厅的人了解民情。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晤建厅刘厅长说今年垦荒达六万多亩，估计今年秋收可够两年食用，一般民众穿吃不成问题。去年青黄不接时有欠食的，现已没有。延市人民生活一般比机关好”。

虽然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丰衣足食，但边区政府并非经常宴客。在1943



2月2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阳历新年边府没有请客，阴历新年边府和边参共请了一次，七桌，此外就没有请了。其他机关也少见请客。”

直到抗战后期，延安干部饮食仍未与普通群众拉开差距。谢老1944年2月的日记记载了延安南区经济调查报告：“年消费肉类36740斤，7340人，平均每人吃肉五斤；植物油73480斤，每人10斤（吃和点灯）。而延安南区王家沟村十二家农户及南区四家经营副业的，调查则为富裕农民年吃肉14.2斤，中等农5.2斤，较贫农4斤，经营副业的14.7斤，平均为9.4斤。”谢觉哉说：“我们供给标准，大灶月吃小秤肉二斤，一般说，不低。不过

农家饭的作法比我们好。”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边区个别单位供应较为紧张，一度出现以低价购买群众商品的现象。谢觉哉批评某单位总务部门：“总务处对供给的计划与预备有异常成绩，如萝卜、白菜每斤购六十斤以上，市价仅（能购）二十来斤。”

作为高级干部，谢觉哉自己也开展劳动，体会农民的不易。他在194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严重。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北方就不然。去年我们种的洋柿子、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了霜天，萎了。”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在这一方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战争初期，友人陈行健给谢觉哉写信，谈及在前线的见闻，唏嘘不已。在194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谢觉哉誊录了来信内容：“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我在饥饿时候，吃过他们碗里正在吃着的面条。同时我也遇到没有翻身群众的白眼，当我饥饿时候，向他们要开水喝没有，要饭汤喝没有，要在他们正在剥皮收藏的一大堆柿子中吃几个不行，只给坏的、脏的、烂的、不熟的吃……”显然，共产党人收获的民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踏踏实实争取来的。共产党人能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同时在餐桌上也打了胜仗。

(摘自《紫光阁》)

雪花那个飘

齐建水

“真的？”新成的眼一下子亮了，回头看看哥哥，兴奋地说：“哥，咱们一块跟舅舅去！”

新生摇摇头，想了想说：“我才不去呢，要去你去吧。”说完，神色黯然地走出了屋子。

看到这一切，俺清然泪下。王连禹也禁不住泪水横飞。早晨，天刚蒙蒙亮，王连禹要带着新成上路了。俺跟俺娘，还有兰香和新生把他们送到汽车站。新生把一个书包交给新成，那里面盛着新生最心爱的两本书、瓦印子、溜溜蛋、枣木索索，还有一大叠积攒了多年的花花绿绿的花糖纸。

从县城开过来的公共汽车停下来，王连禹正要抱着新成上车，车门打开，有一个人迈下车，大家一看都惊呆了，竟是寿长！俺怔怔地瞅着，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寿长，是你吗？”

寿长上前一步抓住俺的手，说：“梅香，是我啊，我回来了！”

俺喜出望外，兴奋得浑身发抖，都有些站不住了，寿长急忙把俺扶住。“爸爸！”新生和新成异口同声喊道，继而扑进寿长的怀里。

“儿子！”寿长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两眼闪着亢奋的光。

王连禹整个人僵在那儿，一脸的疑惑和尴尬，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姐夫……回来了？”

寿长愤愤地斜着他，两腮的肌肉颤抖着，想说句什么，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一家人往家走，路上遇到几个街坊，街坊们都感到很惊奇，跟着他们一块回到家。

人们问起寿长案子的事，寿长简要地说：“一切都落实清楚了，新生他妈不是我害死的，都怪粮所的防疫员老孙。那天，老孙在县粮食局领了两盒熏粮食害食用的磷化铝，回来路上突然有急事，就放在了俺家里，让我捎回粮所。那几天我正在

外地领着民工挖河，并不知道这事，新生他妈不识字，撬开盒子一看是一些大药片子，就吃了一片，结果被毒死了。那老孙一看死了人，怕承担责任，一直没敢吱声，可一听说我要被判死刑，才慌了神，主动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公安局经过核实，就把我放了。”

大家听了，无不唏嘘连连。额头上有疤的二愣哥惊讶道：“差一点儿造成一桩冤案！”

驴脸的三喜子挠挠后脑勺说：“想来真让人后怕啊！”

俺眼泪扑簌，战战兢兢地说：“差点儿把俺吓死了！”

这时，王连禹一步跨进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以头磕地“咚咚”作响，悔恨地说：“姐夫，对不起，我错了，让你受罪了，你打我一顿吧！”

“受罪？差点要了我的命啊！”寿长恨恨地瞪他一眼，看样子真恨不得踹他两脚，但还是忍住了，又看看站在门后的俺娘，眼神渐渐松软下来，对王连禹说：“起来吧，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我和梅香有错在先……”

屋里的人一阵沉默。最后是新生打破了静寂：“新成，你还要跟舅舅去东营吗？”（完）

济阳区委区直机关工委关于在区直机关开展“坚持实干、反对虚功”主题征文比赛活动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动员大会和区委十三届六次全体会议精神，让“实干会干、雷厉风行”成为济阳干部的标签，动员引领区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建设与中心城区高度融合的济阳北部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活动时间 3月21日—5月10日

二、活动内容 本次征文活动的主题为“坚持实干、反对虚功”。作品要以撤县设区后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建设济阳北部新区中争当先锋、做出表率为主要内容，立足本职工作

或名誉权纠纷等法律事宜，均由作者本人负责，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评选要求 比赛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发放精美奖品，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新济阳》报进行刊发。

六、征稿方式 参赛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于5月10日前报送区信息（新闻）中心，在文末署上作者真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邮件主题注明：“坚持实干、反对虚功”字样。电子邮箱：xjyfukan@163.com，联系人：尹聪（电话：84232018），李云竹（电话：84232160）。

七、其他事项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由作者本人创作，发现有抄袭者一经核实即取消参赛资格，如涉及著作权、版

济阳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 2019年3月19日